

金惠俊，〈我的恩師許世旭先生〉，《香港文學》第309期，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0年9月，pp. 90-92。

我的恩師許世旭先生

金惠俊

7月1日，11點40分，許世旭先生離開了人世。高麗大學張東天教授來電話時，我正在為參加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忙着收拾行李。我不假思索地訂購了釜山—首爾的往返機票立刻往首爾出發了，至於次日赴香港之事暫且不管，旅行包、衣服、襪子類還擺在居室地板上。

先生於1934年7月26日出生在韓國任實。先生的祖父在日本侵占韓國時期由於發動民間抗日的義勇活動被日警拷問致重病而鬱鬱以終，先生的叔祖素有深厚的漢學底蘊並曾經考中朝鮮最後一屆科舉而代替祖父將家統和傳統傳承給後代。在韓國戰爭時期，先生中止學業而在家塾裏在父親的嚴管之下專念漢文兩年。當時先生正是十七、八歲的光景，白天南韓軍警防守，夜間北韓遊擊隊“山客”下來，從高祖起四代所搜集的數萬卷經史子集漢籍被年輕山客用來采暖而化為紅紅的火焰也是那時。

我是先生故世的前一天聽到先生發病的消息。聽說，最初先生4月底從某個宴會回來後身體稍感不適但以為只是一般的腹痛，後來於5月下旬才知道患了一種血液癌，到了6月初病症突然開始加重。5月中旬韓國教師節前後，幾個住在首爾的學生為了去拜訪而與先生聯系時略略知道了先生身體不宜，但大家還以為過幾天就會轉好的，甚至一直到與我聯系的那天始終以為並不是那麼危篤的情況，因為先生雖不適但可以談話。因此我也打算從香港回來後去探病，然而這完全是我的過錯，先生再沒有時間等我這不才弟子而忽忽離開人世了。

去靈堂的路途中我在汽車裏、在飛機裏、在地鐵裏始終悔恨自咎。這兩年除了偶爾通過電話，什麼時候見過先生？自我前年到美國做一年的訪問學者以後似乎一直沒有見過面。那麼大概是我邀請中國社科院林非教授和香港嶺南大學梁秉鈞教授一行人到我所任職的釜山大學的2007年深秋吧？先生一方面為了看十幾年交情的好友，一方面為了應學生的連續幾次的邀請而赴釜山一趟。當時先生戴着黑色貝雷帽子、褐色太陽眼鏡，與我、林非教授、肖鳳女史、李曉虹教授、梁秉鈞教授以及我的學生們——對他來說是徒孫們一起遊覽太宗台，那麼瀟灑，那麼開朗。

韓國戰爭結束後，先生從私塾“沖出”而回到高中，又從鄉裏“沖出”而進入韓國外國語

大學中國語系。1959年2月先生於該系畢業，乃是第一屆畢業生。稍後1960年10月又一次扔掉好不容易找到的教師工作，拿着中華民國政府獎學金就肩背棉被蚊帳、手提細竹書箱坐了一星期的貨輪船赴濕熱的台灣留學。

先生在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念書時曾經承蒙過著名女作家謝冰瑩女史的熏陶，尤其是在中文習作上蒙受到她的親身教導。不到一年，先生的天稟所使，由葉維廉等學友們的建議和介紹，竟在台灣文壇上正式登壇。自從1961年在台灣《現代文學》和《作品》上分別發表了兩篇詩歌和兩篇散文以來，迄今創作了豐富多樣的中文作品。例如詩集有《雪花賦》(1985)、《東方之戀》(1994)，散文集有《許世旭自選集》(1982)、《城主與草葉》(1988)、《許世旭散文選》(1991)、《移動的故鄉》(2003)，詩歌散文合集有《藏在衣櫃裏的》(1971)，等等。

不言而喻，先生的文學天賦當然在韓國文壇也盡其所有，詩集有《青幕》(1969)等等四部，散文集從《移動的故鄉》(1976)到《與燕巖同行的五月熱河》(2008)等等有二十餘部。翻成中文的韓國作品有《春香傳》(1964)、《韓國詩選》(1964及1994)、《徐廷柱詩選》(1978)，譯成韓文的中國作品有《中國古代名詩選》(1990)、《中國現代名詩選》(1990)等等十幾部，其中也許對韓國人影響最廣的是朱自清的〈背影〉。

1972年夏天先生與愛穿韓國傳統雙層夏布長袍的父親永遠離別了。祭三虞(第三次祭奠日)回來的那天，先生接到韓國《隨筆文學》的委托，該刊正在籌備創刊，特地請先生翻譯中國散文一名篇，而先生當天晚上立刻翻譯了該篇。原作已有深厚情意和婉約筆觸，先生又有深沉情懷和含蓄筆致，其文如何不言而喻。機緣不止於此，也許是先生的孝心和真誠得到回應，後來有位教育部編修官閱讀此篇大有感受，經過一段小曲折竟在韓國中學教材上刊載數十年。無數韓國人每讀此篇時就反思父子之情、為人之情，可我現在只能回憶先生的往事。

終於到了高麗大學醫院。見到先生的遺像，什麼都不能想。白色菊花中的先生依舊微笑着，好像隨時會用圓潤洪亮的嗓音與我說“惠俊，你來了!”似的，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

黑色喪服、蒼白顏容的師母和令媛極為沉着，好像不在此時此地而在彼時彼地。而我實在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問不得先生的患病經過，只會反復辯解着沒能經常探望的緣由，結果反而師母勸我別太自責、別太難過。

靈堂入口與我一同受業的同門們好像喪主一樣接待着客人，好幾個研究生也正忙着整理訪名錄、收拾東西，裏邊已來了很多弔喪的客人，教授們、學生們、文友們、朋友們、親戚們…短短幾個小時已來了那麼多人、那麼多悲傷。

先生於1968年獲博士學位從台灣學成回國。1969年開始於先生的母校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1986年受聘於我的母校高麗大學至1999年退休。生前歷任中國學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學會、韓國中語中文學會等的會長，直至去世時還榮任高麗大學榮譽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隨筆文友會會長等。先生的學術造詣既廣泛又深刻，已出版了中文版《韓中詩話淵源考》(1980)、《中國新詩論》(1998)等將近二十種學術著作。我最早看的是《中國隨筆小史》(1981)和《中國現代文學論》(1982)，當時劃着底線試圖概括內容的情景，至今還記得清

楚。我認爲最能體現先生學術成就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史》(1986)、《中國近代文學史》(1996)、《中國現代文學史》(1999)等“中國文學史三部曲”以及《中國現代詩研究》(1992)。我曾經向先生建議過再寫一本《中國當代文學史》而先生也不無此意，但先生晚年比較注重散文，這本大作竟成了未完之作。

我是先生的第一個高麗大學的研究生，就是所謂的“大弟子”。我早在先生決定調職後訪問香港時第一次見到先生，那時我是作爲短期研究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書的。這樣算起來我與先生不通過書本而直接結緣已有二十五年了。原來我的學習興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乃至文學運動，我的博士論文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研究》。但後來我還寫過〈中國新時期散文的流變述評〉、〈香港專欄散文的嬗變與未來〉等等有關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論文，又翻譯過《中國現代散文史稿》(林非)、《中國當代散文審美建構》(李曉虹)等，這都與先生的引導有關。先生一邊教我閱讀許多散文精品，一邊讓我接觸諸多散文理論，常常勸我研究和翻譯散文作家作品。

在靈堂，我只能待半個小時，因第二天要趕航班去香港，不得不匆忙坐飛機回釜山。回來收拾好行李後看錶，已是過了午夜。忽忽，忽忽，忽忽。難道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嗎？先生的一生決不會是忽忽忙忙的吧？在我眼裏先生總是那麼從容不迫，偶爾也看到先生快速的一面，例如從某演講會或研討會回來馬上給有關人士寫感謝信，又如夏天吃韓國冷面或冬天吃湯面時我們還吃不到一半先生卻已吃完。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覺得先生急促倉促，我們總覺得先生是那麼安詳有餘。可這一次先生爲何這樣忽忽離開了？先生曾說過一樣一生不停地“沖出”，難道“安逸”這個詞這一次也是對先生來說決不成立的嗎？要早起，那麼應該早一點入睡，但這可真不容易。

香港悶熱極了，高達攝氏34度了。初見先生時是冬天，與先生永別卻是夏天了。有一年我邀請美國葉維廉先生到釜山大學做演講，同時爲了讓先生與故友重逢，我私下也請先生來釜山一趟。當時先生因另有事情與我約好下一次來訪，但兩位後來還是在首爾相見了。記起此事，我到了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酒店後立即向幾位先生的海外舊友報喪。其中葉維廉先生夫妻托我代向師母轉達他們的哀戚，而他們的電郵是這麼開始的：“我們的老友，自1960年啊！就這樣走了，我們有無限傷痛，綿綿斷碎，太多的記憶湧復。…”是的，太多的記憶。於他的親人，於他的親戚，於他的親朋，於他的我這樣的親傳，還於他的從來沒見過面的無數親愛的讀者們。

* 2010年7月5日，台灣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追贈先生鶴山文化藝術勳章，認爲先生“通過藝術文化在諸多領域上做出突出貢獻並留下重大影響”。

香港文學

HONG KONG LITERARY 309

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

尤 今

尤 今 · 白舒樂 · 張維輝 · 胡明碧

陳維靜	小說	穿越風沙線
羅新士	散文	地雷陣上的彩虹
黃 煒	評議	蕭啟章的香港空間後現代創舉
沙 平	閱讀筆記	張真悟的「談詩」與「譯書」
羅偉南	評述	成大放學——從蘇偉林說起
何福仁	評述	太史公之謎
李 季	悼念	送別高麗
金燕傑	悼念	我的恩師許世用先生



我的恩師許世旭先生

金志復

金志復，華語文學系，現任輔仁大學，韓國高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1994），香港中文大學亞洲研究系主任（1985~1987），現為輔仁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著有論文〈中國新時期散文的流變述評〉（1998）等。著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之「民族形式論爭」》（2000），譯著《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黃修己，1981，共譯），《中國現代散文史》（林非，1981），《中國現代文學史》（尹昌，1994，共譯），《中國當代散文發展史》（李維成，2000）。



1984年11月10日赴地學與地理系聚餐，與系主任韓世旭（1984年於金門訪問時所攝的遺照），左起：洪兵、韓國詩人許世旭、洪兵、鄭勉予、金志復、洪兵、李季。

7月1日，十一點四十分，許世旭先生離開了人世。高麗大學張東天教授來電話時，我正在為參加第八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忙著收拾行李。我不假思索地訂購了釜山——首爾的往返機票立刻從首爾出發了。至於次日赴香港之事暫且不管，旅行包、衣服、襪子擺滿在居室地板上。

先生於1934年7月26日出生在韓國任實。先生的祖父在日本侵佔韓國時期由於發動民間抗日的義勇活動被日警神問致重病而鬱鬱以終，先生的叔祖素有深厚的漢學造詣並曾延考中朝鮮最後一屆科舉而代替祖父將家說和傳統傳承給後代。在韓國戰爭

時期，先生中止學業而在家點裡在父親的嚴管之下專攻漢文兩年。當時先生正是十七、八歲的光景，白天南韓軍警防守，夜間北韓遊擊隊「山客」下來，從高祖起四代所搜集的數萬卷經史子集漢籍被年輕山客用來取暖而化為紅紅的火爐也是那時。

我是先生逝世的前一天聽到先生發病的消息。聽說，最初先生4月底從某個宴會回來後身體所感不適但以為只是一般的腹痛，後來於5月下旬才知道患了一種血液癌，到了6月初病症突然開始加重。5月中旬韓國教師節前後，幾個住在首爾的學生為了去拜訪而與先生聯繫時略略知道了先生身體

不宜，但大家還以為過幾天就會轉好的，甚至一直到與我聯繫的那天始終以為並不是那麼危篤的情況。因為先生雖不聽話但可以談話，因此我也打算從香港回來後去探病，然而這完全是我的過錯，先生再沒有時間等我這不才弟子而忽忽離開人世了。

去靈堂的路途中我在汽車裡、在飛機裡、在地鐵裡始終很很自辱，這兩年除了偶爾通個電話，甚麼時候見過先生？自我前年到美國做一年的訪問學者以後似乎一直沒有見過面，那麼大概是我邀請中國社科院林非教授和香港嶺南大學梁秉鈞教授一行人到我所任職的釜山大學的2007年深秋吧？先生一方面為了看十幾年交情的好友，一方面為了應學生的連環幾次的邀請而赴釜山一題。當時先生戴着黑色貝雷帽子、褐色太陽眼鏡，與我、林非教授、肖鳳女士、李曉虹教授、梁秉鈞教授以及我的學生們——對他來說是徒孫們一起遊覽太宗台。那麼瀟灑、那麼開朗。

韓國戰爭結束後，先生從私塾「衝出」而回到高中，又從那裡「衝出」而進入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系，1959年2月先生於該系畢業，乃是第一屆畢業生。稍後1960年10月又一次扔掉好不容易找到的教師工作，拿著中華民國政府獎學金就將摺棉被披披，手提摺竹書箱坐了一星期的貨輪船赴滿熱的台灣留學。

先生在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唸書時曾經承蒙過著名女作家冰瑛女士的薰陶，尤其是在中文習作上蒙受到她的親身教導。不到一年，先生的天賦所使，由葉維廉等學友們的建議和介紹，竟在台灣文壇上正式登場。自從1961年在台灣《現代文學》和《作品》上分別發表了兩篇詩歌和兩篇散文以來，迄今創作了豐富多樣的中文作品。例如詩集有《雪花賦》（1985）、《東方之戀》（1994）、散文集有《許世旭自選集》（1982）、《城主與草葉》（1988）、《許世旭散文選》（1991）、

《移動的故鄉》（2003）、詩歌散文合集有《藏在衣櫃裡的》（1971）、等等。

不言而喻，先生的文學天賦當然在韓國文壇也盡其所有。詩集有《青墓》（1989）等等四部，散文集從《移動的故鄉》（1976）到《與英岩同行的五月熱河》（2008）等等有二十餘部。譯成中文的韓國作品有《春香傳》（1984）、《韓國詩集》（1984及1994）、《徐廷柱詩集》（1978）、譯成韓文的中國作品有《中國古代名詩選》（1990）、《中國現代名詩選》（1990）等等十幾部，其中也許對韓國人影響最廣的是朱自清的《背影》。

1972年夏天先生與愛穿韓國傳統雙層夏布長袍的父親永遠離別了。祭三歲（第三次祭墓日）回來的那天，先生接到韓國《國學文學》的委託，該刊正在籌備創刊，特地請先生翻譯中國散文一篇。而先生當天晚上立刻翻譯了該篇。原作已有深厚情意和純約筆觸，先生又有深沉情懷和含蓄筆致，其文如何不言而喻。機緣不止於此，也許是先生的孝心 and 真誠得到回應，後來有位教育部編譯官閱讀此篇大有感受，經過一段小曲折竟在韓國中學教材上刊載數十年，無數韓國人每讀此篇時就反思父子之情、為人之情，可我現在只能回憶先生的往事。

終於到了高麗大學醫院，見到先生的遺像，甚麼都不能想。白色菊花中的先生依舊微笑着，好像隨時會用圓潤洪亮的嗓音與我說「惠復，你來了！」似的，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似的。黑色喪服、蒼白面容的師母和令嫂極為沉重，好像不在此時此地而在彼時彼地，而我實在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問不得先生的患病經過，只會反覆聊解著沒能經常探訪的緣由，結果反而師母勸我到太自責，別太難過。

靈堂入口與我一同受業的同學們好像喪主一樣接待着客人，好幾個研究生也正忙著整理訪名錄。

收拾東西，裡邊已來了很多平輿的客人。教授們、學生們、文友們、朋友們、親戚們……短短幾個小時已來了那麼多人，那麼多悲傷。

先生於1968年獲博士學位從台灣學成回國，1969年開始於先生的母校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1986年受聘於我的母校高麗大學至1999年退休。生前歷任中國學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學會，韓國中語中文學會等的會長，直至去世時還兼任高麗大學榮譽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濟華文友會會長等。先生的學術造詣既廣泛又深刻，已出版了中文版《韓中詩話溯源考》（1980）、《中國新詩論》（1985）等將近二十種學術著作。我最早看的是《中國雜筆小史》（1981）和《中國現代文學論》（1982），當時對書底層試圖概括內容的情景，至今還記得清楚。我認為最能體現先生學術成就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史》（1988）、《中國近代文學史》（1996）、《中國現代文學史》（1999）等「中國文學史三部曲」，以及《中國現代詩研究》（1992）。我曾曾向先生建議請再寫一本《中國當代文學史》，而先生也不無此意，但先生晚年比較注重散文，這本大作竟成了未完之作。

我是先生的第一個高麗大學的研究生，就是所謂的「大弟子」。我早在先生決定調職訪問香港時第一次見到先生。那時我是作為短期研究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唸書的，這樣算起來我與先生不僅通書本而直接結緣已有二十五年了。原來我的學習興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乃至文學運動。我的博士論文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研究〉。但後來我繼續寫過《中國新時期散文的流變述評》、《香港專欄散文的嬗變與未來》等等有關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論文，又翻譯過《中國現代散文史稿》（林非）、《中國當代散文審美建構》（李曉虹）等。這都與先生的引導有關。先生一邊教我閱讀許多散文精品，一邊讓我接觸諸多散文理論。常

常勸我研究和翻譯散文作家作品。

在靈堂，我只能待半個小時，因第二天要趕航班去香港，不得不匆忙坐飛機回釜山。回來收拾好行李後看錶，已是過了午夜。忽忽、忽忽、忽忽。難道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嗎？先生的一生決不會是忽忽忙忙的吧？在我眼裡先生總是那麼從容不迫。偶爾也看到先生快緒的一面，例如從某演講會或研討會回來馬上給有關人士寫感謝信。又如夏天吃韓國冷麵或冬天吃湯麵時我們還吃不到一半先生卻已吃完。但是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覺得先生忽忽促促。我們總覺得先生是那麼安詳有餘。可這一次先生為何這樣忽忽離開了？先生曾說過一生不停地「衝出」，難道「安穩」這個詞這一次也是對先生來說決不成立的嗎？要早起，那麼應該早一點入睡。但這可真不容易。

香港悶熱極了，高達攝氏三十四度了。初見先生時是冬天，與先生永別卻是夏天了。有一年我邀請美國業餘康先生到釜山大學做演講，同時為了讓先生與故友重逢，我私下也請先生來釜山一趟。當時先生因另有事情與我的好下一次來訪，但兩位後來還是在首爾相見了。記起此事，我到了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酒店後立即向幾位先生的海外舊友報喪。其中業餘康先生夫妻託我代向師母轉達他們的哀戚。而他們的電郵是這麼開始的：「我們的老友，自1960年啊！就這樣走了。我們有無限傷痛、絲絲斷斷、太多的記憶湧現。……」是的，太多的記憶。於他的親人，於他的親戚，於他的親朋，於他的我這樣的親傳，還於他的從來沒見過面的無數親愛的讀者們。

（2010年7月5日，台灣釜山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搶灘先生釜山文化藝術勳章，認為先生「通過藝術文化在諸多領域上做出突出貢獻並留下重大影響」。）